

# 通过这扇门里有个“时光银行”

文/王鑫 图/赖啸天

当城市在春节伊始加速奔跑，城北一隅的老物件展览馆，却如一位沉默的长者，静静伫立于喧嚣之外，悄然开启一条通往过去的慢速隧道。

在通过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桂园小区北门对面的老物件展览馆，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，1万多件“百姓家当”在灯光下静默陈列。从上世纪40年代的煤油灯捻子到上世纪末的286电脑，它们不是冰冷的展品，而是一部用体温焐热的“民生编年史”，记录着普通中国人以三代人的接力，把贫瘠的日子过成如今幸福模样的历程。



## 从“三转一响”到智能时代，一个家庭的“物质长征”

展馆显眼处，停放着一排排锈迹斑斑的凤凰牌自行车。1962年出生的馆长刘波涛介绍，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“大件儿”，相当于如今的一辆中级轿车。“那时候结婚讲究‘三转一响’——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，再加一台收音机，凑齐这四样，小伙子说媒时腰杆都能硬三分。”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解放牌缝纫机的踏板仍留着磨损痕迹，燕舞收音机的旋钮仿佛还能

拧出《东方红》的旋律。这些如今看似不起眼的旧物，曾是无数家庭省吃俭用数年才能置办的“奢侈品”。刘波涛用30年时间，从废品站、拆迁房、老乡的阁楼里一点点抢救出这些记忆，他感慨道：“它们被淘汰的速度，恰恰是中国奔跑的速度”。

展柜里，一沓沓粮票、布票、油票，边缘早已卷曲。40后、50后的参观者常会在此驻足良久——那些票面额度的精打细算，凌晨排队买年货的凛冽寒风，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窘迫，构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最普遍的生活图景。展馆另一端，笨重的286电脑与最早的“大哥大”手机，如同两座时代界碑，宣告着物资匮乏时代的终结，也开启了通讯发展的新篇章。



## 供销社里的幸福辩证法，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

一比一复刻的供销社展区，是展馆人气最旺的地方。老花色布料叠放得整整齐齐，水果硬糖在玻璃罐里泛着诱人光泽，小人书的封面色彩虽已斑驳，却依旧藏着岁月的温度。

“那时候逢年过节、结婚办大事，才能到供销社扯几尺布做新衣裳。”刘波涛指着柜台

后的量布尺说道，“这尺子量的是布料，更是一个家庭一整年的盼头。”这种盼头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幸福观。搪瓷缸上的“奖”字、印着红双喜的暖壶、镶着塑料花的镜子，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结婚“标配”，如今看来简陋寒酸，却是当时年轻人能想象到的最好生活。

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，从“能用就行”到追求品质生活，这些老物件像一把把标尺，丈量出中国百姓80年来对幸福的不懈追逐。它们见证了父辈祖辈在物资短缺年代，用勤劳与节俭为家庭筑巢的坚守；也提醒着当下的我们：美好生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一代代代人用汗水浇灌的果实。

## 光影流转中的精神图谱，从“文化饥渴”到文化自信

展馆深处的老电影院区，1600部胶片电影静静沉睡。这里没有90年代以后的商业大片，收藏的是《地道战》《英雄儿女》《五朵金花》等经典影片，是早期珍贵的纪录片影像，更是露天银幕前，人们搬着小板凳守候的童年回忆。

“那时候看电影是全村的大事。”刘波涛放映起一部80年代的草原纪录片说道，“现在年轻人刷着短视频，很难理解那时看电影的‘奢侈’——为了看一场电影，走十几里夜路，第二天还要照常下地干活。”

从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，到如今公共文化

服务触手可及；从“八个样板戏”独领风骚，到文化艺术市场百花齐放，这些泛黄的胶片记录的不只是娱乐方式的变迁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扩容。

满墙的老电影海报，从《庐山恋》到《牧马人》，从革命叙事到人性关怀，正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生动视觉注脚。而那些绣品、年画、手工灯笼，则藏着另一重文化隐喻：即便在最艰苦的岁月，中国人也从未放弃对美的追求、对仪式感的坚守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基因，正是如今我们谈及“文化自信”的深厚底气。

站在展馆尽头回望，由老物件铺就的“时间河”波光粼粼。从手作灯笼到如今的智能手机；从凭票供应的窘迫到扫码支付的便捷，80年的翻天覆地，浓缩在这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，也镌刻在每一个中国家庭的记忆深处。

2026年春天，我们在此按下“暂停键”，并非沉溺于怀旧的情绪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出发。记住粮票年代的拮据，才更懂今日丰衣足食的珍贵；回味露天电影的纯粹，才更珍惜文化繁荣的当下；触摸父辈掌心的老茧，才更明白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的真谛。

## 采访手记

采访完毕走出展馆，通辽街头灯火璀璨，归家的人们步履匆匆。而那些留在时光博物馆里的老物件，仿佛化作无声的嘱托：要像祖辈父辈那样，认真追赶幸福，温柔握紧当下，努力创造未来——这，便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，对时代最好的回答。

# 记忆里的供销社

任志鸿



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，村里曾经有代销店或代销点，乡里有一个供销社，在政府和中学中间，很长一排砖瓦房，很气派。

等我们村里有供销社时，在村子东头，很空旷的一个大院子，不开门时木板封门封窗，所以我妈有时就催我：“快点去，一会儿关板儿了！”开门营业也叫“开板儿”。

那时觉得售货员挺牛的，风吹不着，日晒不着，在柜台里拿这递那。他们分组站

柜台，食品组、五金组、洗护组、布料组等等，交款时要先开票，把票掂掂在半空中的一条铁丝上，“嗖——嗖——”地传递到会计那核对，真是无比神气。

“买两茶叶！”售货员拿杆小秤，秤盘落到茶叶箱子里，抓拉着小秤砣，看秤杆上的星，左右移动着，秤杆低了就抓点茶叶进去，高了就抓出去点，直到秤杆平平的，最后把茶叶倒在一牛皮纸上，利落地

包裹起来，买的人心满意足地揣走了。

我是家里的小跑腿。时常拿着空瓶子去给家里打酱油、打酒，还给妈妈打雪花膏。妈妈有一个友谊牌雪花膏瓶，白瓶绿盖，一打开喷香。当妈妈用手指在里面挖了又挖，抿了又抿，再也抿不出一丁点的时候，妈妈就让我去供销社打雪花膏了。售货员用一个刮板挖了一坨白白的、凝脂一样的雪花膏，往瓶子里一放，如果不满，就往空隙处再添补一些，用刮板一刮，大概二两吧，一块钱，够妈妈擦小半年。有时候我也会偷偷地剃一指甲，在额头、鼻梁、脸蛋儿、下巴都点上，再均匀地擦抹，小脸蛋儿果然就既湿润又亮堂，再贪婪地深呼吸几下，那淡淡的香味可真是好闻呀！

小时候，常往供销社跑，买蜡烛、打火石、盐等，如果能剩几分钱，也万万不敢私藏，至于糖果，只能在玻璃罐前流连，吞咽几下口水，然后一咬牙转身离去。其实我也不缺糖，哥哥姐姐们放假回来一准给我买各种糖果，奶糖、软糖、大虾酥，比单一的水果硬糖好吃多了，我积攒的糖纸花色五花八门，都是其他小朋友没见过的。以至于我小小年纪便一口蛀牙，七八岁了都不长新牙，人送外号“小豁牙”。

有的

售货员“上眼皮”，看人下菜碟，很让人心里恼火。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发小骑自行车去县城的供销社，在一个卖化妆品的柜台前，我们几个好奇地东看看西看看。其中有一瓶天姿粉底液，瓶口像天鹅的颈，我问售货员，这个多少钱？结果那个售货员用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语调，不屑地说道：“十八呢——”那个“呢”字拖着长长的鼻音，当时就把我的火气勾起来了，我说拿出来我看看！那个女人毫无表情地将那瓶粉底液拿出来，“当”一声落在柜台上，我什么也没看，就说：“我买了！”那时我是一名乡中学教师了，她看我穿着朴素，风尘仆仆的，认定我是乡下人，只是来过过瘾的，断然拿不出这18元钱。

多年以后，我们几个发小聚在一起时，还会拿腔拿调地模仿那句：“十八呢——”然后会意大笑。

我们去供销社时，冬天有人在门口卖炒熟的葵花籽。花一毛钱买上一碗，装在兜兜里，边走边嗑，又香又脆，算是跑腿的小费。后来我做编辑，常常看到一些怀旧的稿件，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供销社里的热闹，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的匮乏与生活的窘迫，也有少年买冻梨和年画时的欢喜。文字里的年代感瞬间将我带回到过去。

我不禁想起我和伙伴们在供销社门口突发的创业梦想：那就是批发一袋爆米花糖，2分钱一根，批它100根，就站在卖瓜子的旁边，1毛钱一根，一根赚8分钱，100根就能赚8元，8元，巨款啊！几个小姑娘兴奋得要跳起来了，可是一想到我们“进货”要用的2块钱，一下子又都熄火了……